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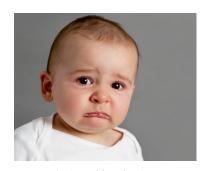
Sally Clark: 一个被错误的统计证据毁掉一生的母亲*

2007年3月16日, Sally Clark 的家人悲痛地宣布, Sally 于当日清晨在家中去世。Sally Clark, 这位可怜的母亲在被精神问题困扰多年后,因酒精中毒离开人世。这一切悲剧始于一项对她错误的审判:被控谋杀了两个儿子,之后虽然被证明是无辜的,但是她也始终没能从中恢复过来。下面,我们详述事情的经过,并从统计的角度进行讨论。

1996 年,Sally 与 Steve 的第一个儿子,Christopher,在出生 11 周后突然去世。去世的原因被认定为自然死亡,医生,邻居对他们一家丧子之痛同情万分。然而,3 年后不幸再次降临,她仅8 周大的第二个儿子,Harry,又以同样的方式猝死。这次,他们没有得到同情,与此相反,却受到了质疑。4 周后,这对夫妇被警方逮捕,并被控谋杀两个儿子。最后,Sally Calrk 被判处终身监禁。饱受丧子之痛的母亲在监狱中承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煎熬,虽几经上诉,直到 2003 年,新的证据才证明她的清白,随后她被释放。巨大的伤痛使这位母亲的生活异常艰难,只能靠酒精麻醉缓解痛苦。2007 年,Sally Clark 因酒精中毒离开人世,从此彻底摆脱进入天堂见到了两个儿子。



Sally Clark



妈妈是被冤枉的。。。。。

记者 Geoffrey Wansell 把 Sally Clark 案件称为"现代英国法律史上最大的不公"。这是因为在审判中,儿科专家 Roy Meadow ¹错误地使用了统计证据和统计推理,因而误导了陪审团,最终导致悲剧发生。

不合理的统计证据——独立性问题。Roy Meadow 在证据中有如下陈述:在一个家庭中,一个婴儿突然夭折是一场悲剧,两个婴儿猝死值得怀疑,三个婴儿的死亡则可认定是谋杀,除非能够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²他声称,像 Clark 这样一个富裕、不抽烟的家庭,一个婴儿猝死的概率仅为1/8543,两个婴儿猝死的概率为 (1/8543)² = 1/73000000。Roy Meadow 假设两个婴儿的死亡是独立事件,也就是说,第一个婴儿死亡的概率不会影响第二个婴儿死亡的概率,这如同扔硬币,第一次得正的概率不会影响第二次得正的概率。伦敦每年大约有 700000 婴儿出生,根据上述结果,Meadow 认为一个家庭中两个婴儿均猝死的事件每 100 年才发生一次。

^{*}本文作者高磊、宋培培和杨晓康。

¹Roy Meadow 的详细资料。

²这一说法又称为Meadow 定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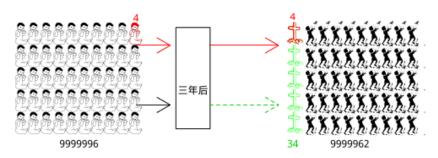
Roy Meadow 提供的统计证据忽略了两个婴儿死亡之间的关联性,把两个婴儿死亡过于简单地当做独立事件。事实上,当一个家庭中出现了婴儿猝死事件,就有理由认为这个家庭存在着引起婴儿死亡的高风险因素(基因、环境等因素),因此再次发生婴儿死亡的概率将有所提高,仍然使用1/8543 这个概率是愚蠢的。这比愚蠢还糟糕,这是坏科学。基于以上考虑,Roy Meadow 得出的骇人听闻的概率 1/73000000 就不可信,并且所谓的 100 年发生一次也是一种凭空想象。然而,当这些证据呈现在法庭上时,没有人提出质疑。



提供的统计证据是错误的

错误的统计推理——检察官谬误。³1/73000000 意味着什么?英国一位著名记者报道,Roy Meadow 认为 1/73000000 是 Sally 无罪的概率。不必责备 Roy Meadow,也无需苛责陪审团,我们 很多人也认为 Roy Meadow 的推理是正确的,甚至有人感觉这是朴素的概率论常识。然而,这是亟需纠正的错误,用一张图示来解释其中的缘由。

我们假设,在某段时间内有 1000 万名婴儿出生。需要注意的是,为了叙述方便,我们用一名婴儿代替两名婴儿,当我们讲到一名婴儿怎么样时,其实是说两名婴儿的情况。比如,我们说,一名婴儿的母亲具有谋杀动机,其实我们想说的是,生育两个婴儿的母亲想杀死自己的孩子。



1000 万婴儿出生后 3 年内的存活状况

把婴儿们分成两组,分组的标准是他们的母亲是'好'(S)还是'坏'(N),'好'指母亲疼爱自己的孩子,'坏'指母亲具有谋杀自己孩子的动机。众所周知,虎毒不食子,几乎没有母亲会谋杀自己的孩子。用概率的语言表述,就是'坏'母亲概率极低,CONI(Care of Next Infant)的研究表明,拥有'坏'母亲的婴儿比例为

$$P(N) = 0.0000004.$$

换句话说,在 1000 万名婴儿中,平均而言,只有 4 名婴儿的母亲具有谋杀动机,用左图右上角的红色小人表示这些不幸的婴儿。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婴儿来说,如果他们的母亲想要谋害他们,几乎不费吹灰之力。因此,如果一名婴儿的母亲想要害他,这名婴儿是不可能存活的,三年后,这些

 $^{^3}$ 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犯了统计错误,被称为"检察官谬误"。检察官谬误的详细解释请参阅 $^{
m Prosecutor}$'s fallacy。



婴儿几乎都被其母亲害死,我们用右图左上角的红色坟墓表示这 4 名被母亲谋杀的婴儿。因此,一名拥有'坏'母亲的婴儿三年内必然死亡,用概率表示:

$$P(D|N) = 1.$$

相对来说,另外 9999996 名婴儿无疑是幸福的。生活水平也许有好有坏,但他们有一个疼爱自己的母亲,把这些婴儿用左图的黑色小人表示。因此,拥有好母亲的婴儿比例:

$$P(S) = 1 - P(N) = 0.99999996 \approx 1.$$

然而,我们知道,对于新生婴儿来说,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他们的死亡,甚至最终也查不出原因所在,儿科医生干脆把不明原因的死亡称为婴儿猝死综合征(SIDS)。CONI(Care of Next Infant)的研究表明,婴儿死于 SIDS 的概率为:

$$P(D|S) = 0.0000034.$$

这也就意味着,在 9999996 名婴儿中,平均而言,三年后有 34 名婴儿死于 SIDS,我们用右图左侧绿色坟墓表示 34 名死于 SIDS 的婴儿。除此之外的 9999962 名婴儿,将会进入儿童时期,用右图右侧掷飞机的小人表示。

上图全景式地展现了婴儿出生后三年内的存活状况,而且可以回答我们在 Sally Clark 案件中遇到的问题:如果观察到一名婴儿死亡了,那么他死于 SIDS 还是母亲谋杀呢?在上图右侧 38 名死亡婴儿中,34 名死于 SIDS,只有4 名死于母亲谋杀,比例分别为

$$P(S|D) = \frac{34}{38} = 0.89,$$

 $P(N|D) = \frac{4}{38} = 0.11.$

换句话说,当观察到一名婴儿死亡时,我们会做出如下判断:这名婴儿死于 SIDS 的概率为 89%, 而死于谋杀的可能性为 11%。

我们还可以根据概率运算法则 —贝叶斯公式得到与上述结论一致的结果。利用贝叶斯公式分别 计算 P(S|D) 和 P(N|D):

$$\begin{split} P(S|D) &= \frac{P(D|S)*P(S)}{P(D|S)*P(S) + P(D|N)*P(N)} \\ &= \frac{0.0000034*0.9999996}{0.0000034*0.9999996 + 1*0.0000004} \\ &= 0.89; \end{split}$$

$$\begin{split} P(N|D) &= \frac{P(D|N)*P(N)}{P(D|S)*P(S) + P(D|N)*P(N)} \\ &= \frac{1*0.0000004}{0.0000034*0.9999996 + 1*0.0000004} \\ &= 0.11. \end{split}$$

以上过程解释了 Sally Clark 有更大的无罪概率,但仍未讲明 Roy Meadow 以及陪审团犯错的原因。我们继续探究这一问题。事实上,陪审团成员并没有犯'错',他们使用了频率学派(统计有两派:频率学派和贝叶斯学派)的方法进行估计,更确切地说,他们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来寻找一名婴儿死亡的原因。⁴

⁴关于极大似然估计与贝叶斯估计的区别,请参阅神文数学之美番外篇:平凡而又神奇的贝叶斯方法。



极大似然估计建立在似然函数基础之上,意在寻找使似然函数最大的那个参数。在 Sally Clark 案件中,就是寻找使

$$P(D|$$
原因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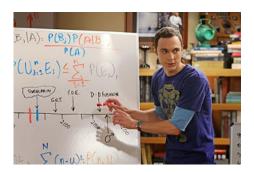
最大的那个原因。前面已经讨论过,如果原因是"谋杀"(N),那么似然函数值为

$$P(D|N) = 1;$$

如果是 SIDS(S), 那么似然函数值是

$$P(D|S) = 0.0000034.$$

显然,当原因是"谋杀"时,似然函数值更大。所以,我们会倾向于认为 Sally Clark 谋杀了自己的孩子。



Sheldon 用贝叶斯公式估计自己的寿命

极大似然估计的致命缺点是没有考虑"原因"本身可能性的大小,当这些原因的可能性有显著性差别时(本例中,具有谋杀动机的母亲和关爱孩子的母亲比例差距颇大),极大似然估计的结论就会大错特错,本例中陪审团的判断是其生动体现。与之相反,贝叶斯估计方法综合考虑了原因本身可能性大小("先验")和似然函数值("似然"),会给出一个更加可信的估计和判断。

参考资料:

- Beyond reasonable doubt
- Multiple sudden infant deaths coincidence or beyond coincidence?
- 维基百科: Sally Clark
- Sally Clark 的主页